



一张煎饼果子传递的经济信号: 2002年1.5元 现在6元

2月末,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逼近100万亿元

2002年,北京一张加鸡蛋的薄脆煎饼果子卖一块五,2013年3月10日晚,北京街头一位摊煎饼的师傅告诉记者:“普通的六块,加火腿肠七块五。”

央行10日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 displays,2月末,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达到99.86万亿元,逼近100万亿元,而2002年初,这一数字大约是16万亿元。“货币超发”成为公众热议话题。

用广州一位白领的话说,“在某些方面,钱越来越不值钱了”,“五年前我挣4000元,房价8000元/平方米,现在我挣8000元,房价2万元/平方米。”

全国政协委员、广东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说,2009年时,他在提案中建议中国发行千元面值钞票,有很多人质疑。但现在有人和他他说,“再看这个提议,不觉得多离谱了”。

真是货币超发导致物价上涨吗?一些专家直言“不靠谱”。

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,CPI增速是考察货币是否超发的一个信号。去年下半年以来,CPI增速已基本稳定在3%左右,政府对货币供应的控制比较精确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、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也认为,政府多年来对货币发行的基本态度比较稳健,甚至采取一些行政手段控制物价过快上涨。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,中国实行的是接近20%的高准备金率,相当于把相当一部分资金关在了笼子里。其次,中国人习惯把钱存在银行里,也导致市场流通的货币规模还是没有想象中

大。但很多人认为,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,房地产都成了消化通胀的主要“蓄水池”。股市低迷、银行低利率,投资房产成了百姓财富保值增值的主要工具。这些年,房地产投资投机需求越堵越多,正是因为老百姓手里的钱无处可去。

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晟表示,目前,不动产资产占中国普通工薪阶层的财产比例超过60%。“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,和货币发行量有关。与其说是百姓关心自己的钱包怎么才能不缩水。要让老百姓看到信心。”陈晟表示。

高盛集团资产管理部中国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认为,今年政府提出经济增长的目标是7.5%,货币增速13%,比去年实际增速略低,货币政策已然显现出稳健信号,“防止房价上涨,如果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,效果可能比行政措施更有效”。

分析 中国真的“钱太多”了吗

央行最新统计数据 displays,2月末,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达99.86万亿元,突破100万亿元为期不远,同比增长15.2%。这是这一指标增速连续第二个月超过15%。迅速增长的货币供应量再次引起公众对“货币是否超发”的热议。专家认为,央行仍将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,但货币供应可能会比前期有所收紧。

接受记者采访的金融界代表委员和专家认为,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并不等于“过多印钞票”,也不是助推通胀的唯一原因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说,物价上涨与货币供应增长和信贷总量过多有点关系,但也是购买力需求上升、输入型通胀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曹红辉表示,由于全球金融危机,各国政府普遍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,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货币供应不跟调整,就可能承担更大的危机转嫁成本。有市场判断认为,在全球经济放缓、多国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环境下,一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速对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是必要的,但专家也提醒,要防止过度依赖资金来拉动增长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在广义货币供应量继续扩张的同时,2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为6200亿元,低于1月的1.07万亿元;同期社会融资规模为1.07万亿元,远低于1月的2.54万亿元。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,新增贷款减少主要是春节等季节因素,且1月份企业的资金需求会比较大。

(摘自《山西晚报》)

院士称中国耕地不到世界10% 却耗掉全球1/3化肥

除了广受关注的政协关于绿色农业的“一号提案”,食品安全问题是否可控、有机食品如何名实相符,都使得今年政协农业讨论组的讨论成为焦点。

由此,记者日前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全国政协常委武维华,他指出,过去几十年,尽管粮食一直在增收,但农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,照中国现在的农业生产环境,几乎有可能生产真正意义上的有机食品。

尤其引起武维华注意的是——中国用不到世界10%的耕地,却耗掉了全球化肥总量的1/3。他对此建议称,应按照供需关系生产化肥,提高氮肥利用率,减少农业污染。

氮肥过剩

记者:你怎么看目前有机食品市场的现状?

武维华:过去这几十年,尽管粮食一直在增收,但农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,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。主要的原因就是,由于我们的粮食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,所以就玩命地生产,但是在资源节约、环境友好方面考虑得不够到位,所以造成目前的这种状况。

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,我国的农业生产环境已显著恶化,几乎没有可能生产真正意义上的有机食品了。在我国,可以逐步推进部分绿色有机的产品,但完全模仿欧美国家有机农场标准是不太现实的。

我们学校有教授做过试验,同样的水稻品种,在与农民稻田条件基本相同的地块,如果采取完全不用化肥和农药的种植办法,稻谷的产量只有农民稻田产量的1/3甚至更低。

记者:既然如此,绿色农业又如何建立呢?



武维华:今年“一号提案”提到水、肥、土地资源利用的问题,我想说的是,应围绕如何提高氮肥利用率,减少农业污染。

首先应搞清楚化肥(氮肥)的供需关系,应该按需生产,没必要生产那么多的化肥(目前我国的氮肥生产能力过剩近总量的1/3);其二是通过改良作物品种,以提高作物的肥料利用效率,当然,这是一个较长期的战略目标。

我国耕地面积占全球耕地面积的8%左右,但是我们养活了全球超过21%的人,这是我们的成就,但是我们这不到10%的耕地,却耗掉全球化肥总量的1/3,接近35%,前两年是32%~33%。

而且,我国农作物生产中的氮肥利用率和生产效率,远远低于发达国家。利用物、分地区来统计,玉米、小麦氮肥利用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几,发达国家的氮肥利

用率可以超过50%,接近60%。

一般来说,在我国越是发达的地区,化肥用量就越大,浪费也比较多,而贫困地区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,化肥使用量还不够,达不到国际上的平均水平。沿海发达地区氮肥合理的使用水平,每公顷大概能减掉将近900万吨,而不发达地区有些施得不够的地方,还可以补进去300万吨左右,所以我们有可能会减少约600万吨氮肥的施用量。

在化肥生产方面,过去的布局有失误,造成了目前氮肥生产能力过剩约30%的状况。

突破底线后

记者:对于中国来说,最重要的是农业的生产要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,这被看成是一个底线,你怎么看待这个底线?

件国产化率为诱饵,看清中国相关法律体系、机构认证透明度不足等漏洞,有意为之。

近两年本土品牌汽车在乘用车领域的召回数量仅为4例,今年1月1日起实行的缺陷汽车召回新条例有所弥补,补偿仍然偏低,可能存在经营者与生产商的推诿现象。

中国出口的食品往往是质量最好的,但价格常常低到令人羞耻的程度。即使以降低标准增加合格率的办法,也不能说服消费者消费国内奶粉,即使把优质食品出口到国外,也无法改变信用折价的现实。

黄浦江死猪事件,让上游小农经济、地方政府执政乏力大曝光,还暴露出中国食品安全的致命伤,那就是国民对污染的麻木,与环保素质的低劣,他们甚至对近在身边的灾难淡定自如,在空气高度污染中谈笑风生。

破坏性的高速增长、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、九龙治水的多头管理、对环境的麻木,一起构成了低劣食品的保护伞。降低发展速度,修复环境,建立环保利益链条,让信用得到收益,建立现代农业,改变国民素质,是食品安全必不可少的基础。

连自己都不保护自己,谁能保护我们?

(摘自《每日经济新闻》文/叶檀)

叶檀:谁能保护食品安全

不用到“3.15”,食品安全、产品质量时刻触动着大众敏感的神经。从车辆到食品,最终到饮用水、空气,无人能够在环境灾难中幸免。

中国产品的信用折价让人痛心,已成为经济转型的最大拦路虎,不仅在国际上销量存疑,甚至在国内都不被信任,国内消费升级最大的受益者可能不是国内企业,而是质量有一定保障的外企。这在奶粉行业上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产品信用折价有些是经济增长过快、消费增速过快的必然产物,只有放慢速度、改变上游产业结构才能解决质量问题。

我国牛奶消费增长速度全球第一。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成为中国奶业的分水岭,此前高速增长,此后原地踏步,为之前的高速增长付出惨痛代价。据乳业专家王丁棉发表的《中国奶业面临机遇与挑战》报告表示,在2008年之前的10年中,国内乳品行业处于高速发展时期,生鲜奶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7.4%。而自2008年发生三聚氰胺事件后至今生鲜奶总产量年均增长率骤降到1.29%,国外奶源的进口量大增近500%。随着进口奶源总量的上升与本土价格竞争激烈,目前全国700余家乳品加工企业亏损的企业已接近40%。这四年多以来,我国人均占奶量仅略升0.3公斤,这才是有些安全保障的奶源正常的增速。

“洗脚妹”代表:长期分居致大量农民工结成临时夫妻

日前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“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”为主题,邀请王亮、铁飞燕、朱雪琴、邓前堆、朱良玉、刘丽代表就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。

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:我想问北京代表团朱良玉代表和安徽代表团的刘丽代表,您两位作为新当选的农民工代表,打算如何履职,两位代表现在比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?谢谢。

刘丽: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我想向所有的媒体朋友表示感谢(起身鞠躬)。我曾经是一名洗脚妹,因为记者朋友把我的事迹报道出去之后,才有了今天这个机会坐在这里和这么多的朋友在一起,来谈论我的故事,包括我的履职情况。

对于如何履职,我从个人角度出发,归纳了三条:一是要学习。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当一名合格、称职的人大代表。我相信有些人也去洗过脚,如果你没有学会洗脚之前是不可能去给别人洗脚的。作为一名人大代表首先要去学习宪法、法律等,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地去履职。

二是认真履职。因为小时候我妈妈教育我说,做什么要有什么样,所以我觉得当上人大代表就得像个人大代表的样。打工20多年来我一直都是一名农民工,农民的身份干着工人的活,过着流浪者的生活。这种无固定收入、无固定住所的日子真的非常不容易。

三是坚持做人的原则。做一个好人,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,做一个让父母值得骄傲的人,做一个兄弟姐妹认可的人,社会会认可我。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有没有解释你的问题。谢谢。

中国妇女报记者: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女代表们,除了铁飞燕代表,因为我们报社已经对您做了专访,您可以稍微休息一下,另外两位女代表,你们在履职当中因为女代表的身份,是不是让你们更加关注女性职工权益的保护,如果有的话,你们关注在哪些方面,请具体说明。第二,针对我们所有代表的,可以重点请几位男士谈一下,比如朱良玉代表,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对你们未来的工作会有怎样的影响?谢谢。

刘丽:好,谢谢。其实我还真的为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,也就妇女这一块,这个关于农民工系列问题当中其中有两是关于妇女的,那我就拿一条出来做个案例吧。因为现在打工的热潮还在进行当中,农村结婚也比较早,有的是因为一个人出去打工,因为家里面的太老、小的太小需要照顾,那没办法,只能一个人留在家,一个人出去打工,就造成了什么现象呢?

现在这个年代也不像以前,一个女人可以抱着一个贞洁牌坊过一辈子。现在因为长久的分居,导致了建立在不影响夫妻关系的情况下,组建了打工潮下

的临时小夫妻。也许很多人听了很意外,但是在我身边,在我这个群体非常地常见。那这样子的增多,本来就早结婚的农村夫妻婚后导致了离婚率的增高,也影响了下一代的教育,甚至导致两个家庭都不得安宁,所以就这一现象我也在我的建议当中提到了这样的解决方案。

第一,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。因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,城市的繁荣也离不开农民工,可是保障性住房每个城市都在加大建设,而且还有很多,为什么农民工就无缘享受呢?所以是不是可以考虑降低申请保障性住房的标准?这是第一。

第二,也许是我从我的角度大胆的想法,现在很多城市里面的人都是以收房租在过日子的,很多房子都是空着的,那是不是可以考虑由政府租过来,然后再收取房东税收,那直接从房租上面可以给他扣掉,然后税后的房租是不是可以由政府再来返租给农民工,可以不用受户籍的限制,也可以从其他方面的限制,比如说他在这个城市待三年、五年、六年,对这个城市做的贡献去申请房子,这样子解决了住房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夫妻甚至一个家庭(分居问题)。另外还有一个案例,以后有机会我再详细地跟大家分享,跟大家报告,谢谢。

(来源《央视》)

武维华:这个底线已经被突破了,我们国家曾在1996年的世界粮食大会(罗马)上向全世界承诺,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将不低于95%,但去年的自给率降到90%左右。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,进口进一步扩大是必然的。

2012年底海关统计,我们进口大豆5838万吨,全球的大豆贸易量只有9000万吨,全球大豆贸易量的2/3被我们买走了。现在还有观点,说大豆不算粮食,我个人不同意这种观点。比方,现在女生一天三两米饭足够了,如果肉、蛋、奶、油什么都不给你吃的话,你一天吃一斤粮食可能都不够。“文革”期间我在学大寨的工地上劳动,一天三斤玉米面吃得干干净净,因为肉、蛋、奶、油什么都没有。

计划经济的时候,城里一个人一个月2两油,一年2斤4两,而当时90%以上人口都在农村,都没有油。而现在,全国平均一个人一年消费掉40斤油,已经超过日本和韩国的食用油消费量。

记者:虽然说保证吃饭是第一问题,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食品安全问题。

武维华:现在食品安全问题,弄得全国人民人心惶惶,草木皆兵。

事实上,很多食品安全领域,有的安全问题,媒体放大了,有的安全问题没报道出来。例如农药的问题,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它没有问题,问题是,好多农民在用国家不准用的,高毒低效的农药。因为好多生产厂家偷偷地生产,它便宜。

事实上,真正的高效低毒农药还是很安全的,好多农药打上一个星期就没事了,它往往还有针对性,比方说它是杀昆虫的,那它对昆虫的神经系统有毒害,对人没毒害。(摘自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文/郭丽琴 丁灵平)

全国人大代表:养老金双轨制加剧贫富差距

“今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继续提高10%。”全国两会上传出消息,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将实现“九连涨”。然而,代表委员更关注的是如何改变长期存在于养老金双轨制中的不公。一项调查显示,97%的网民对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上调幅度非常不满意,实现“养老公平”已成为必须解答的社会课题。

“改革养老金双轨制,不能再拖下去了!”全国人大代表刘翔浩认为,养老金双轨制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。

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《社会保障绿皮书》和《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》也证实了这一看法。在被调查者中,75.4%的职工养老金低于2000元,92.3%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都高于4000元。其中,2011年8月,被访者领取的养老金最低为200元,最高为1万元,相差50倍。

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认为,公务员和相当一部分事业单位人员在任职时不用缴纳养老保险,退休后却能领取高于企业人员的养老金,且公务员的退休金多数由国家财政支付,“显然有失公平”。

在现实生活中,这样的感受更加明显。全国政协委员张文学告诉记者,一位拥有40多年工龄、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级人才,退休后养老金却是他在政府机关退休的大学同学的1/4。

全国政协委员张泽熙则认为,尽管国务院连续9年给企业退休职工增加养老金,但由于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基数远低于机关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基数水平,因此,同比例增长养老金,企业退休职工依然跟不上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增幅,绝对值之间的差异不是缩小了,而是增大了。

“养老并轨喊了那么多年,也搞了5个试点,可总体进展缓慢,为什么?”全国政协委员李志军指出,养老双轨制的根源还是在于行政体制中的“隐形障碍”——政府机关既是退休养老金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受影响者。因此,只有在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上有所突破,实现政事彻底分开,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得以顺利进行,养老金“双轨制”才能从根本上破解。

“养老金双轨制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,改革势在必行。”李志军委员表示,事业单位改革牵涉面非常广,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。据了解,目前我国约有126万个事业单位,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约4000万名(含退休职工),规模庞大,“这部分职工的权益也应该保护。”

许多代表委员表示,改革养老金双轨制不是把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拉下去,而是将企业职工养老金提上来。

对此,张泽熙委员建议,加快制订到2020年为止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接轨计划,提出具体改革目标、时间进度和主要举措,尽快落实责任,确保养老体制改革在规划期内取得重大突破。

(摘自《工人日报》文/张锐 郑毅)